

九曲棹歌

金银珍 著

与韩国九曲文化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朱熹〈武夷棹歌〉对韩国九曲文化影响研究》(10YJAZH038)

《九曲棹歌》与韩国九曲文化

金银珍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韩国九曲文化是以朱熹的《九曲棹歌》作为范本形成的文化现象,由九曲歌系诗歌、九曲园林和九曲图绘画三大部分组成,既有中国传统元素的传承和发扬,又有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自身艺术特征。而一部诗歌文本,能够在文学、园林、绘画等诸多领域产生如此深远影响、在异域形成一方文化且维系 500 年之久,在中外文学史上绝对罕见。

本书在对《九曲棹歌》文本的意象世界和结构模式予以多元解读的基础上,对韩国九曲歌系诗歌、韩国九曲园林与韩国九曲图进行了历史性的解读和共时性的阐述,并从比较文学、园林学、景观学、美术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视角,对韩国九曲文化进行立体化的研究和透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曲棹歌》与韩国九曲文化 / 金银珍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608-5373-4

I. ①九… II. ①金… III. ①文化史—研究—韩国
IV. ①K312.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2188 号

《九曲棹歌》与韩国九曲文化

金银珍 著

责任编辑 陈佳蔚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孙晓悦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349 000
印 数 1—1 5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5373-4

定 价 4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诗人朱熹

朱熹(1130—1200)是继孔子之后对中国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代宗师。对此,蔡尚思教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描述: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这是1988年4月蔡尚思先生在福建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之时写下的一首诗作,蔡先生指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当肯定的两座文化高峰是“孔丘”与“朱熹”,这是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位名人一次非常明晰的座次排名。

这位与“孔丘”相提并论的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祖籍婺源(今江西婺源,宋时属徽州)。宋建炎四年(1130)九月十五日,朱熹生于尤溪(今福建尤溪),宋庆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日卒于建阳考亭(今福建建阳),享年71岁。朱熹的别号很多: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在建阳芦峰之云谷建成草堂,榜曰“晦庵”,遂自号“晦庵”,又号“云谷老人”;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建阳建成“竹林精舍”,后更名“沧洲精舍”,遂自号“沧洲病叟”;宋庆元元年(1195),朱熹欲上封事为被罢相的赵汝愚辩护,门人以为不可,蔡元定以蓍草卜卦,遇“游”之“同人”,朱熹遂焚奏稿,自号“逖翁”。此外,朱熹在晚年还曾自称“晦翁”、“云谷外史”等。朱熹去世9年以后,宋宁宗于嘉定二年(1209)诏谥朱熹曰“文”,故后世普遍称其为“朱文公”。

中国古代学者的入仕之路几乎都是坎坷重重,朱熹却似乎是个例外,他历任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先后担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南康知军、提典江西刑狱公事、江东提刑、秘阁修撰、漳州和潭州知府、湖南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侍讲等职。

绍兴十七年(1147)秋,18岁的朱熹参加建州的解试;次年春,到京城参加省试,中进士,名列第5甲第90名。朱熹之所以能顺利地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除了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小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朱熹5岁入小学读书,8岁时举家由尤溪迁居建瓯,居于环溪精舍,经常聆听父亲朱松(1097—1143)讲述古今成败兴亡大事。绍兴十三年(1143),其父朱松病故,时年14岁的朱熹遵父亲临终嘱托,跟随当地著名学者刘子翥

(1101—1147)、刘勉之(1091—1149)、胡宪(1086—1162)三人。这些早年的受教育经历为他日后参加科举和从事教育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中进士后的第三年(1151),朱熹经铨试出任同安县主簿,两年后正式莅任。绍兴二十五年(1155),职兼学事的朱熹在县学大成殿后建尊经阁,并建教思堂于明伦堂之左。他经常与县学诸生往还,讲说修己治人之道,在《同安县谕学者文》^①一文中,他要求学生要有“爱日不倦,而竞尺寸之阴”的治学精神。淡泊仕进的朱熹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离开同安,之后近23年的时间主要在崇安(今武夷山)和五夫里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其间还多次去延平向名儒李侗求教,并筑寒泉精舍进行讲学。隆兴元年(1163)十二月,朱熹被任命为武学博士,但辞职不就。淳熙二年(1175),与吕祖谦(1137—1181)、陆九渊(1139—1193)、陆九龄(1132—1180)等在江西信州(今上饶)鹅湖寺聚会论辩。淳熙五年(1178),49岁的朱熹被任命为江西南康知军。在知南康军的两年中,复兴白鹿洞书院是朱熹的主要政绩之一。此时朱熹所厘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适用于朱熹讲学的其他书院,而且为全国各地书院广泛借用。绍熙元年(1190),朱熹知漳州,在州学建二斋,还考虑大规模扩充州学,后因次年离任而未果。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被任命为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兼荆湖南路安抚使,在任仅两个月,复办岳麓书院,讲学授徒。他在《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②中表述:复置岳麓书院是为了“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以为优游肄业之地……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业解惑”;在目前“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的状况下,朱熹“深以讲学教人之务为寄”,以广教育人才之意。离开潭州后不久,朱熹还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之职一段时间。朱熹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多次评议朝政,因而受到执政韩侂胄(?—1207)的排挤攻击,朱熹的学说被诬为“伪学”,他也被解职回崇安。从庆元元年(1195)至庆元六年(1200)朱熹去世这6年,史称“庆元党禁”时期,朱熹及其门人在政治上受到迫害。但他在建阳考亭仍“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不停地进行教书育人活动。在朱熹的一生中,他被朝廷任命而又实际到职的6次,共计8年5个月10天。^③除了从政和出游外省近5年之外,主要在福建的崇安和建阳云谷、考亭居住和活动,足迹还遍及闽北、闽东、闽南、闽中的其他15县。^④成年以后,每到一处,或读书讲学于书院,或修建书院,或为书院题匾额,或为书院作

① 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同安县谕学者文》《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66页。

② 朱熹:《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全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三七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564页。

③ 林克敏,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编:《朱熹》,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④ 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83页。

记。南宋以后福建书院的兴盛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他个人与福建的20余所书院直接相关。福建后来有不少书院是在其门人祭祀、纪念他的庙宇及祠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朱熹在闽的教育活动,除了振兴同安县学和漳州州学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创建书院及讲学。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北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理学的基础上,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认为“理”是世界存在的根源和基础,“气”是第二性,所以有“理在先,气在后”、“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他提出“太极”是理的最高境界,但同时又提出理与气两者密不可分,理没有气不会存在,气没有理也不会存在,后世将他的学说和“二程”的学说并称为“程朱理学”。理学又称道学,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元、明时期,从清朝中期开始走向衰落。自东汉魏晋以来,以精密的思辨和发达的来世观念著称的佛学,吸引了包括学识渊博的士林在内的社会各界;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逐步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至唐则达鼎盛,俨然有凌驾于儒学之上的架势。中国传统儒学第一次遭遇异域文化的重大挑战。是时,尽管其人生哲学仍然保持着儒家价值观,但大多数士大夫的思想深处早已受到佛学的深刻影响。对此,张载(1020—1078)的门生范育(生卒年未详)在《正蒙》“序”中如此阐述:

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①

除了佛学的超强吸引力以外,儒者对待儒学的态度上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自汉唐以来,儒者大都拘守章句训诂,殊少发明义理,故而难以满足社会上的理论需求,尤其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需要。因此,北宋中期以来,一批思想敏锐的儒者为了应付佛教的挑战,发起儒学革新运动。这些儒者清楚地认识到,以“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②的汉学,显然不足以抵挡佛学的蔓延,应该复兴原始儒学那种“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③的开放精神,这便成为了宋代儒者们的使命。这样,以中晚唐日益壮大的儒学复兴为前导,以韩愈(768—824)、李翱(774—836)开启的由斥佛、排佛到“援佛入儒”的思想运动为契机,北宋诸子经过多方面努力,终于创建精致的思辨体系——理学。理学,亦称新儒学,又称“道学”、“宋学”。之所以称为

① 蔡仁厚著:《宋明理学·北宋篇》,长春:长春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81页。

② 王遵常主编:《中国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论》(先秦两汉分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

③ 贾谊:《过秦论》,李巍编著:《国粹》,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第179页。

“理学”，是因为两宋诸子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的最高范畴；之所以称为“新儒学”，是因为理学虽以儒家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在融合佛、道中被改造，具有焕然一新的面貌；之所以称为“道学”，是因为宋代理学诸子自认承继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宣称他们的学问以“明道”为目标；之所以称为“宋学”，是因为清代乾嘉年间考据学大兴，清代诸儒推尊汉儒，指斥宋代理学之空疏，遂以“汉学”与“宋学”对称。如上所述，理学虽然名目繁多，但究其本质，实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而建立起来的伦理本体论。至此，孔孟儒学发展至北宋时期，完成了“理学”博大精深的理论形态和思想体系，并出现了多个学派。在宋代诸学派中，以江西庐山周敦颐（1017—1073）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和程颐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和福建闽北朱熹的闽学最为著名。福建古称为闽，把朱子学说称为闽学，是因为朱熹生卒和居住于福建，受学于福建的理学家，并著述、讲学于福建，在福建形成强大的朱子学派。正如清朝闽籍学者蒋垣所云：

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①

由此可见，闽学之所以名“闽”之真正含义了。“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②“朱熹继承‘洛学’程颐的天理范畴，汲取‘关学’张载的气质变化，按照‘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道德修养原则，精心建构了以理气关系为基础的程朱理学大厦，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素养和缜密的思考，创造性地完成整个理学思潮的集大成，系统回应了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对学术思想的历史挑战，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新的发展高潮。”^③闽学同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共同构成理学主要支撑。朱熹集中国古代理学之大成，对宋代以后的哲学、教育、礼制等都有重大影响。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四部儒家经典合订为一部书，称为《四书》，作为儒家的必读经典。《四书》后来又与儒家传统经典《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成为之后几个世纪的教科书，对中国教育的意义可谓深远。

朱熹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乃至自然科学上都有较大成就，并且多有著作留世，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西铭解》、

① 高令印：《闽学概说》，邹永贤主编：《朱子学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② 全祖望：《宋元儒学案序录》，冯天瑜、彭池、邓建华：《中国学术流变·论著辑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7页。

③ 张立文主编：《闽学：理学的集成》，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

《易学启蒙》、《四书或问》、《通书解》、《太极图说解》等，文学作品有《菩萨蛮》、《水调歌头》、《忆秦娥》、《春日》、《观书有感》、《九曲棹歌》等名篇，还有以他与弟子对话为形式的《朱子语类》问答录。《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经朱熹发扬光大之后，成为后世无数学者的追求。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论及刘子翬时，有一段论其弟子朱熹的话：“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大诗人，例如朱熹”。^① 朱熹博学多才，作为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留存有 2 000 多首诗词作品。朱熹的诗作有哲理诗、交游诗、山水诗三大类。其哲理诗并不专意于诗文，借诗语来阐述哲学思想或论学旨趣，闪烁着这位哲人的思想光辉。其诗作中，属于哲理诗范畴的诗作占 17%。^② 其交游诗多为与其师友、门人、官员、僧人、道士等唱和赠答之作，内容有论及学问思想者，也有怀念同游者等。其诗作中，属于交游诗范畴的诗作占 11%。^③ 其山水诗以泉水般的诗情，描写了江南的秀美风景。其诗作中，属于山水诗范畴的诗作占 16%。^④

山水诗，顾名思义是以田园山水风景为吟咏对象的诗歌。我国古代山水诗，车载斗量，蔚为壮观。山水诗同哲理的结合有着悠久的传统，宋代则是我国历史上哲理入诗的盛行时期。作为一代思想家与哲学家的朱熹，在其山水诗歌创作中，继承了我国山水诗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宋诗早期议论粗率生硬的弊病，开创了宋诗的新诗风。他的许多山水诗作，都是在对山水景物认真观察、深入体会和勤奋思考的基础上升华而成，饱含着诗人的真切感受和独到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在感受山水的自然美的同时，常用哲学家的眼光来观察思考，并自觉地把哲理融入山水景物之中，既有诗情，又有哲理，诗情洋溢，理趣横生，含蓄蕴藉，寓意无穷，达到了山水与哲理的巧妙结合。朱熹的山水诗讲究形象思维，在感受山水自然美的同时，把情韵注入玄理，以洗炼晓畅的语言进行表达，体现了美与真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具有鲜明的美感特征。朱熹的山水诗清丽动人，浅显明白，隐含哲理，如千古传诵的《春日》诗：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⑤

① 钱钟书：《钱钟书集·宋诗选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 246 页。

② 李秀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36 页。

③ 李秀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97 页。

④ 李秀雄：《朱熹与李退溪诗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125 页。

⑤ 朱熹：《春日》，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89 页。

《春日》描写了春天万紫千红的盛况,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感悟。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诗人在泗水边信步寻找春天的踪迹,放眼看去,万物复苏,焕然一新。无边的春景悦目而赏心,由外而内,令人颇有感悟。勿说春光短暂,真正懂得了春的含义,不论以怎样的形式表现都不重要了,春,就在这万紫千红点染装扮的景象里。不过,诗人并不写春的哀怨缠绵,也并不着重强调春的温暖清新,而是写出了春的博大和无处不在。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①这是南北朝著名思想家陶弘景(456—536)《答谢中书书》的开宗明义之语。朱熹自然也无法例外。他一生酷爱自然山水,在讲学撰著之余,勤历崇山大川之风景佳丽处,其步履之勤奋、体察之深刻、重游之频繁、兴致之高昂,“足以乐而忘死”,^②正如清代学者沈瑜庆(1858—1918)、陈衍(1856—1937)之《朱熹传》云:

自号紫阳,簞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南康志庐山,潭州志衡岳,建州志武夷、云谷,福州志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丘壑,虽迂途数里,必往游。携樽酒时饮一杯,竟日不倦。非徒效泥塑人以为居敬者。^③

诚如,“非徒效泥塑人以为居敬者”的朱熹决不是一个乏情寡欲、道貌岸然的天生圣人,作为理学家,他大谈性命义理、严格循规蹈矩,倾毕生精力注四书、编礼仪、讲克己、主持守,同时作为诗人,他同样乐山水、好游兴、喜纵酒、多情感、得意忘形、挥洒放浪。因此,朱熹所留大量山水诗,大都情景并茂,生意盎然,且极具哲理内涵,可谓一份难得的山水美学思想遗产。朱熹对山水之美的切身感受是其山水美学思想基础框架,而这种感受几乎寻不见其理学家唯理性主义的一面,展现的是游者的生命情趣和灵敏感知,显现的是诗人气质和士子品性,流露的是对自身生命本真体验的一种真实情怀、对自身山水审美感觉的一种活泼的透视与领悟,故没有也无法依据道体来演绎文本的抽象思辨方法。

朱熹的代表性山水诗作——《九曲棹歌》,作为对武夷山九曲溪的全景扫描,在历代文人骚客吟颂武夷诗作中,首部全面概括描写九曲风貌而广为传诵。郭沫若(1892—1978)《游武夷泛舟九曲》云:

① 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周啸天编著:《中国文学经典》,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② 朱熹:《云谷记》,朱熹撰:《朱子文集·卷十·记》(1—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8页。

③ 沈瑜庆、陈衍纂:《福建通志·福建列传卷十二·朱熹传》(第六十二册),临海: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6年,第39页。

九曲清流绕武夷，棹歌首唱自朱熹。幽兰生谷香生径，方竹满山绿满溪。

六六三三疑道语，崖崖壑壑竞仙姿。凌波轻筏觞飞羽，不会题诗也会题。^❶

闽中山水奇秀以武夷山为第一，而其魂就在九曲溪。武夷山有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峰岩交错，溪流纵横，其大部分风景都分布在九曲溪两岸。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岗山的西南，上游流经山深林密，下游流过星村，进入武夷山风景区，绕过九曲十八弯，盈盈一水，折为九曲，因其有三弯九曲之胜，故名九曲溪。九曲溪全长约 60 公里，而从星村至武夷宫这段则为名震遐迩的九曲溪，全长约 9.5 公里、面积约 8.5 平方公里。澄澈清莹的九曲溪绕过九道弯之后，到武夷宫前汇入崇阳溪，直奔母亲河——闽江之怀抱，她把墨绿色的柔美蜿蜒连同无穷尽的传奇故事，分送给了大半个福建。曲曲九曲山挟水转，水绕山行，曲曲都有不同景致的山水画意。我们应该感谢九曲溪一直以来对这一切的不离不弃的守护。每当站在这道圣美的武夷九曲，耳边自然响起朱老夫子的声声棹歌。

❶ 郭沫若：《游武夷泛舟九曲》，钟作英选编：《郭沫若诗歌》，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6 年，第 325 页。

目 录

	代序 诗人朱熹
1	第一章 多元解读 再释经典
1	一、《九曲棹歌》文本意象世界的审美解读
9	二、《九曲棹歌》文本结构模式的多元解读
11	1. 空间并置
13	2. 空间套叠
14	3. 空间错置
16	三、《九曲棹歌》文本诠释史的历时性解读
22	1. 金麟厚论《九曲棹歌》
25	2. 李滉论《九曲棹歌》
27	3. 奇大升论《九曲棹歌》
31	4. 赵翼论《九曲棹歌》
38	5. 宋时烈论《九曲棹歌》
39	6. 李瀛论《九曲棹歌》
42	第二章 《九曲棹歌》与韩国九曲歌系诗歌
42	一、韩国九曲歌系诗歌之耦合背景
55	二、韩国九曲歌系诗歌类型与鉴赏
85	第三章 朱熹《九曲棹歌》与韩国九曲园林
85	一、韩国九曲园林概论
86	1. 韩国九曲园林的总体特征
90	2. 韩国九曲园林的雏形
94	二、岭南学派的九曲园林
96	1. 陶山九曲园林
122	2. 武屹九曲园林
136	三、畿湖学派的九曲园林
137	1. 高山九曲园林
143	2. 华阳九曲园林
165	3. 谷云九曲园林

181	第四章 朱熹《九曲棹歌》与韩国九曲图
181	一、韩国九曲图对《九曲棹歌》的多元解读
182	1. 山水画
184	2. 概念化图案
186	二、九曲图范本考证
186	1. 武夷山水画迹
194	2. 武夷山志书
196	三、韩国九曲图的历时性解读
198	1. 初期：临摹性九曲图
202	2. 中期：本土化九曲图
210	3. 晚期：多元化九曲图
217	参考文献

第一章

多元解读 再释经典

朱熹的《九曲棹歌》，作为一部优秀的诗歌文学文本，在历代文人骚客吟颂武夷诗作中，因其为全面概括描写九曲风貌之首部作品而广为传诵。《九曲棹歌》创作于宋淳熙十一年（1184），诗题全称《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①是一部描绘武夷九曲溪诸多诗作中的长卷佳作。诗人采用歌词的形式，按逆流而上的顺序，依次勾画出九曲美丽景色，抒写自己闲淡情韵。

“文本”一词来自英文“text”，是作品可见可感的表层结构，广泛应用于语言学、文体学，以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诸般领域中。作为语言的实际运用形态，文本是根据一定的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而组成的整体语句或语句系统，是一系列语句串联而成的连贯序列，构成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系统，因此也是一个意义多元、内涵多重的意义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组织者对语音、语义、意象、意境等不可或缺的构件的相互组建和联接来最终构筑，也是文学语言在多种艺术技巧和规则下共同构建的一个独立、完整、特殊的文本系统。因其所具有的上述主观和客观的诸般过程，文学文本不可避免地具有“封闭性、自足性和能指性”。^②所言封闭性，即文本本身构成的独立、完整的意义世界；自足性，即无需借助文本之外的因素对其加以解释的文本自身包含的构成某种意义的各类要素；能指性，即由于特殊语言组合方式形成的相互作用，它们总是在向读者显示某种语义、寓意或意味，即意义内涵。这些意义内涵期待着读者通过自己的解读去领悟、理解并加以充实。文学文本所具有的自身特征，要求阅读者应该从文本语言组合和意象的把握来完成文本的解读。

一、《九曲棹歌》文本意象世界的审美解读

《九曲棹歌》是一篇描绘武夷九曲溪诸多诗作中的长卷佳作。诗人采用歌

① 朱熹：《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1页。

② 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词的形式,按逆流而上的顺序,依次勾画出九曲美丽的景色,抒写自己闲澹的情韵。全诗除描绘山水之外,还插入神话传说、历史人文景观以及自己的人生感慨,一唱三叹,韵味深长,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九曲棹歌》中的“棹”,即指船桨,“棹歌”本为民歌,其原貌就应该是“但言乘舟鼓棹”,是舟子的“劳者歌其事”,是劳动生活中自然节拍的流露,后演化为与水乡有关的诗词,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法,多为江南一带诗人使用,如著名的有唐代诗人戴叔伦(732—789)的“兰溪棹歌”: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①

诗中的兰溪,在今浙江省兰溪市西南;越中,在今浙江省中部;桃花雨,指春雨。诗的大体意思为:抬头看见发出清凉光辉的月牙儿,挂在水湾的柳树梢上,低头观看越中山峦的倒影映在水平如镜的溪中。兰溪一连下了三天的桃花春雨,溪水猛涨,半夜里鲤鱼都向上游浅滩上涌来,拨鳍摆尾,啪啪蹦跳。

朱熹的《九曲棹歌》,是十首组成的七律组诗,诗人用诗的语言概括地描绘出武夷山九曲溪的全景式山水风景。与今人游武夷九曲溪都顺流而下,由第九曲直至第一曲不同,朱熹则逆流而上,先第一曲最后第九曲,其《九曲棹歌》的描写顺序,也是由一曲终至九曲。十首《九曲棹歌》中的第一首为全诗的总序,然后一首一曲,一首之中,有水有山。例如,一曲晴川和幔亭峰,二曲插花临水的玉女峰,三曲不知几何年的驾壑船,四曲东西两石岩,五曲长时烟雨的平林渡,六曲绕碧湾的苍屏峰,七曲更回看的隐屏仙掌二峰,八曲岩下水潏洑的鼓楼岩,九曲人间别有天的平川。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诗人开首便直奔主题,以“山”的“上”、“下”两个方位词展开空间,以“仙灵”和“寒流”两个人文历史因素和自然现实因素塑造意象,再以“识”和“听”两个动词来探究九曲山水风景之奇妙。诚如南宋理学家、朱熹三传弟子陈普(1244—1315)所言:“其立意固不苟,不但为武夷山水也。第一首言道之全体,彻上彻下,无内无外,散之万物万事,无所不在。然其妙处,过于膏粱之美、金玉之贵也,不可无人发明。”^②

① 孙建军、陈彦田主编,于念等撰稿:《全唐诗选注》(1—16册),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第2309页。

② 陈普注:《朱文公武夷棹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耸立在一曲溪北的高峰，便是入九曲所见的第一峰——大王峰，也叫天柱峰。大王峰的左侧有幔亭峰，在峭壁上刻有“幔亭”二字，而幔亭峰就是神话故事中武夷君宴请乡人之处，也就是“幔亭招宴”之所在地。对此道教界有名的仙宴，南宋闽籍学者祝穆（生卒年未详）在其《武夷山记》中，作如此描述：

幔亭峰在大王峰后。

古记云：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置酒会乡人于峰顶，召男女二千余人，虹桥跨空，鱼贯而上。设彩屋幔亭可数百间，饰以明珠宝玉。中设一床，谓之玉皇座。西为太姥、魏真人座；东为武夷君座。悉施红云茵、紫霞褥，金盂贮花，异香氤霭。初，乡人至幔亭外，闻鼓声。少顷，空中有赞者呼乡人为“曾孙”，使男女分东西，依次进拜。毕，真人抗声言：“汝等曾孙各安好！”遂命男女以东、西坐。

又，亭之东、西有青绫幃幄，内各设床，陈乐具。又闻赞者命鼓师张安陵打引鼓，赵元奇拍副鼓，刘小禽坎铃鼓，曾小童摆鼗鼓，高智满振曹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师鲍公希吹横笛，板师何凤儿拊节板。于是，东幄奏《宾云左仙之曲》。次命弦师董娇娘弹坎篴，谢英妃抚长琴，吕荷香戛圆鼓，管师黄次姑操箏篴，秀淡鸣洞箫，宋小娥运居巢，金师罗妙容挥铎钹。于是，西幄奏《宾云右仙之曲》。乃命行酒，其食品皆非人世所有。酒数行，命歌师彭令昭唱《人间可哀之曲》，曲云：“天上人间今会何稀，日落西山兮夕鸟飞。百年一瞬兮事与愿违，天官咫尺兮恨不相随。”歌罢，彩云四合，环佩车马之音亘空而至。又闻赞者云：“曾孙可再拜为别。”

既下山，风雨暴至，虹桥飞断。回顾山顶，寂无一物，但葱翠峭拔如初耳。乡人感幸，因相与立祠于山下，号“同亭”云。^①

祝穆通过神仙之宴开始时的“虹桥架空”和结束后的“虹桥飞断”、山顶的“金盂贮花，异香氤霭”和山下的“风雨暴至，寂无一物”等场景的对比描述，把“幔亭招宴”的奇诡神秘氛围衬托到极致。唐朝李商隐（813—858）《武夷山》对此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得流霞酒一杯，空中箫鼓几时回。武夷洞里生毛竹，老尽曾孙更不来。”^②朱熹所咏“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正是此意，使人难免陡生些许惆怅之情。传说乡民曾孙十分怀念那场神宴，常上幔亭寻访，

① 董天工修撰，方留章等点校：《武夷山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② 李商隐：《武夷山》，李商隐著，张强、刘海宁解评：《李商隐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干扰了神仙的正常生活。于是仙人遍种毛竹,以作仙凡之间的樊篱。唐以前多把武夷山当成神仙之窟,道教色彩甚浓。有关祭祠、羽化、仙蜕的诸多记载中,朱熹仅采此华美神话入诗,并非因其宗教信仰或崇拜,而是对美丽神话故事的欣赏,为的是展现武夷山历史文化和山水文化魅力,使人们在乐山乐水之际有更多的想象和回味的时空间。儒家因其巨大的包容性,不排斥宗教信仰,对人格神,士大夫常处于似信非信之间,基本信奉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①之理。朱子亦如是。山川风物,他乐之其然,享之其然,更是思之其然。曲畔的水光石上,有摩崖石刻群可供鉴赏。石刻杰作中除明代学者李材(生卒年未详)的“修身为本”之外,还刻有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1528—1588)旅夷时的题词:“大丈夫既南靖岛蛮,便当北平劲敌。黄冠布袍,再期游此。”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复荒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二曲溪口迎人而立的玉女峰,因其酷似亭亭玉立少女而得名。既然是亭亭玉立之少女,自然让人联想起明艳照人的少女像,如南宋道人白玉蟾(1194—?)诗云:“插花临水一奇峰,玉骨琼肌处女容……”^②确如,玉女峰峭拔挺秀、突兀拔空,峰顶花木参簇,整座山峰像束髻簪花的少女,岩壁缝痕似衣裙皱褶,飘飘欲仙。峰下有一处深潭,名为浴香潭,传说是仙女沐浴的地方,峰侧有一处岩石,刻有二丈多高的“镜台”二字,是仙女梳头的地方,叫妆镜台。民间传说云,早在远古之时,武夷山当地常发大水,老百姓只好躲进山里,靠吃野菜野果填肚子。直到有一次大水冲来一个失去了亲人的“大王”,他在退水后带领起当地百姓开出九曲河,终于治理好大水。这一壮举被天上玉皇大帝的女儿“玉女”所见,从此迷恋上了“大王”,便偷偷下凡来到武夷山。二人从相遇到相知,最终结合。可这些事情都被山间的妖道“铁板鬼”所见,暗向玉皇告密。玉皇一怒之下,便将他们变成了两座山峰,这两座山峰便是现在的玉女峰和大王峰。玉帝更是把铁板鬼变成了铁板嶂永远横挡在大王峰和玉女峰中间。朱熹对此浪漫且凄美的爱情故事并未予以更多的展开,仅仅是轻描淡写地一问“插花临水为谁容”。传说玉女峰峰顶多杂树野花,玉女喜爱插花,“插花”一词由此而来。继而,诗人笔峰一转咏道,既然是“道人”且“不复荒台梦”,正和诗题中的“戏作”一词遥相呼应。“道人不复荒台梦”一句,让人联想起杜甫的“云雨荒台岂梦思”^③之意境。

① 朱熹集注:《论语·雍也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55页。

② 白玉蟾:《九曲杂咏十首·二曲玉女峰》,朱逸辉主编:《新海南诗选》,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③ 杜甫:《咏怀古迹·其二》,清·蘅塘退士编著:《唐诗三百首》,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可见,朱熹所具有的世俗平民诗人的气质,他采“玉女”这一民间传说融化入诗,以俗入雅。《九曲棹歌》十首俨然从民家的船歌渔唱融化而来,正是典型的民歌乐府风貌。这也正是后世骚人墨客盈千累万的武夷吟唱,无法在《九曲棹歌》这一千古绝唱之上的真正原因。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三曲咏小藏峰的架壑船。对此“架壑船”,《晋安逸志》云:

游三蓬,秦时人,少孤,与弟乞奴渔。一日,泊梅溪渡口,有老翁甚褴褛,求渡。叩其所往,曰:“皇太姥将宴群仙,能从我游乎?”蓬兄弟幸甚。翁令瞑目坐舟中,但觉蓬蓬如飞。有顷,闻鹤唳,窃视之,则舟已搁岩间矣!遂与众预幔亭之宴游。自是绝粒。或言今三曲架壑船即其所棹也。^①

衣着“甚褴褛”的“老翁”所乘之“舟”,在其得道化去后便“已搁岩间”,便名“架壑船”。对此,朱熹在“武夷图序”如是说明:

……有枯查插石罅间,以度舟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坏。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夷落所居……^②

朱熹认为“架壑船”乃“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夷落所居”之遗物。经碳-14测定,架壑船确实是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悬棺葬遗迹,棺主是当时闽越族“君长”。武夷山的“架壑船”位于三曲小藏峰峻峭的岩壁隙洞间,是船形的木制古遗物,舟中藏有遗骨,称作“遗蜕”。小藏峰的“架壑棺”尤以凌空悬挂的惊险之势而形成称奇千古的胜观。面对半悬于空中、风雨不毁、“不知停棹几何年”的“架壑船”,朱熹由衷地发出“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的人生感慨,这便是对历史的思考,更是对生命的追问。尽管我们无从知晓架壑船主停棹几何年,但是这些生前能够面对大自然自由展示自己本然的一面,死后又傲居高崖,面水而眠,坦坦荡荡,怎能不令人发出一种豪气?沧海桑田、人生天定、死活无常,“泡沫风灯”般的短暂人生,难道不应该去珍视生命,乃至不畏死亡吗?此乃一曲内涵历史纵深感生命咏叹调。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氤氲。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①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夷山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522页。

② 朱熹:《武夷图序》,清·庄仲方编,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南宋文范》,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3页。